

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



青铜器

◆ 祝中熹 李永平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

◆ 祝中熹 李永平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青铜器

●李学勤

总序

“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的编著出版，对于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专业人士，以及热心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广大读者，都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好事。

如丛书编者在策划时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甘肃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正由于这样，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现代考古学在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而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所附《中国考古学年表》，便可看到在1900年以后，甘肃即有敦煌藏经洞文书写本和敦煌附近简牍等重大发现，成为考古工作的先声。近年为众所艳称并被频繁引用的王国维先生1925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演讲，其中提到的四大发现，上述简牍、文书就居其二。现今已形成独立学科并盛行于国内外的简牍学（或简帛学）、敦煌学，其缘起俱不能离开甘肃。

甘肃考古发现影响深远的，自然不限于简牍、文书两项。我们在这里不妨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得求解于甘肃。

以下请容我举几个例子——

甘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作为仰韶文化分支的马家窑文化，包括半山、马厂类型，早已因其彩陶的高度艺术成就而著名。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安大地湾的发掘，展示了甘肃东部存在的仰韶文化所具有的地方特点，并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其中有相当丰富的彩陶，为探索中国彩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长期以来，总有人主张彩陶的外来说的问题，可能由此导向解决。

过去一直列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齐家文化，如今不少学者认为应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甚或初期的青铜时代文化。齐家文化和近年确定的四坝文化，都有较多的早期铜器，比如齐家文化的铜镜，是中国最早的第一面同类出土品，即得自广河齐家坪，时在1975年。早年还有一面更大的，传出于临夏，现藏于权威的国家博物馆。这些已经超出一般早期铜器只是小件饰物、工具的范围。其实，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一件青铜器物，是甘肃东乡林家遗址1975年出土的铜刀，属马家窑类型，年代是公元前3 000年左右。看来，要寻求中国青铜器的起源，甘肃乃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区域。

四坝文化已肯定为青铜文化。另外在甘肃还有辛店、寺洼、沙井等文化，传流更晚。四坝文化大致相当于夏代，而寺洼文化下限竟延至西周晚年。这些文化的族属难于定论，但与殷商甲骨文中的羌、西周金文里的戎有关，是易于推想的。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已及甘肃，在文献内有为周恭王所灭的密国，位于今天的灵台。灵台白草坡出有“泾伯”等青铜器的西周墓，当属于密。西周与大西北的关系是很多的，在《穆天子传》中有不少反映，而我们所知尚很有限。金文里的西北地名，如不其簋、多友鼎及最近所见逯（佐）鼎所记，无疑有些在甘肃境内，有待今后结合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考定。

我曾指出，不其簋的作者不其就是秦庄公其。簋铭中的地名有一个是确定的，即在天水西南的西（西垂）。1919年，天水西南发现秦公簋，器上刻有“西”这一地名，见王国维在清华的弟子冯国瑞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992年至1993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等文物，使我们有可能深入研究秦国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一部分流散材料的辑集，目前还是当务之急。

礼县发现的文物，如窃曲纹铜甗，已经透露了与欧亚大陆文化

交流的有关信息。至于汉代以后作为这种交流主干的丝绸之路，更是以甘肃的河西为咽喉要径。从汉代的经营西域，到唐朝的对外交通，在甘肃留下了大量古迹，积淀了丰厚遗存。武威雷台的“马踏飞燕”（俗称铜奔马），器形虽小，却以汗血马绝尘奔驰的形象，成为当时开拓精神的象征。其艺术造诣广得称誉，殊非偶然。

至于敦煌石窟及所藏写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集中凝聚，也体现了多民族、跨疆界文化的沟通、融会，浩繁博大，便用不着我在此赘言了。

“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共有10种，分别论述古生物与古环境、彩陶、青铜器、早期秦史、岩画与墓葬壁画、古代建筑、简牍、长城、古代民族和佛教艺术，可谓系统全面。执笔者均系有关方面专家，书的质量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以深入浅出的文笔，把多年研究成果和学界最新论点，介绍给读者，是我们应当感谢的。敦煌文艺出版社的各位先生，投入很大精力，出版这套丛书，也应在这里致以敬意。

2003年3月2日于北京

●陈炳应

绪论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历经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从汪洋大海逐渐演变成山地型高原，屹立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的交会处。地理环境复杂而神秘，有黄土高原、冰川雪山、草原绿洲、戈壁沙漠……孕育中国文明的两大母亲河——黄河、长江，或支流纵横、贯通甘肃南北，或以支流滋润着甘肃的部分地区。

最近一万年来，气候也历经了多次巨变，复杂多样：既有亚热带温湿气候，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也有温带、暖温带干旱气候和高寒半干旱气候，宜牧宜农，既造就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和多民族格局，也造就了人们强悍、开拓的精神风貌。

甘肃位于我国的地理中心，东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省相邻，与中原、江南、东北相通；西与多种族、多民族文化汇聚的新疆接壤，从而连通了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南临青海、四川，可通西藏、云贵和南亚、东南亚；北连内蒙古、宁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而可与欧亚草原和大漠相通。总

之，它成为人们东来西往、南去北进的交通孔道，成为欧亚旧大陆交通、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为国内外各族人民的往来、交流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条件，也造就了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的格局。

甘肃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神话传说——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传说他们本是兄妹，后来结为夫妇。他们在混沌初开或天崩地裂、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等自然巨变之后，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立四极以柱地，积芦灰以止淫水；抟土作人，化万物；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作庖厨；造文字、创历法、画八卦、制嫁娶、设官作乐，以通神明，类万物，治天下；还有钻木取火，尝百草，制九针，立占筮之法等等。其子孙又迁徙四方，繁衍于全国各地。总之，他们是龙的传人公认的共同祖先，是中国悠久、灿烂文明的源头之一。此后，周人先祖躬耕于陇东，秦人先祖牧马于陇南、天水，并分别发展成统一中国的周、秦帝国，为今天的大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初期，月氏人从甘肃河西走廊西迁中亚，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中亚地区的强国，并创造了著名的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界传播，成为今天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同时，乌孙人也从河西走廊西迁伊犁河流域，成为中亚强国之一。十六国时期，甘肃的少数民族——氏族苻氏、羌族姚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前秦、后秦政权，为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甘肃的后凉、南凉、北凉、西秦、仇池、宕昌等政权，也是由甘肃的少数民族创建的，对各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至于各方面的杰出人才那就更多了，如飞将军李广、哲学家王符、书法家张芝、医学家皇甫谧、收复河西的张议潮、祖籍甘肃陇西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大诗人李白……都在历史上负有盛名。

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神奇的人民，创造了神奇的文明。神话传说并不是凭空编造的，而多是自然、社会巨变和古人认识世界的折射，是古代文化的一种，对于我们研究远古世界弥足珍贵。不过，它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发生的事件、发明创造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例如上述伏羲、女娲的功绩可涵括距今约几百万年到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还有，因为古代没有文字或有文字而对经济文

化记载过于简略，使今人知之甚少，甚至众说纷纭，疑信参半。如何才能证实、充实呢？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金钥匙。

近代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传播于全世界，并逐步完善提高。它泛指对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切遗物、遗迹的调查、发掘、研究；研究所获得的社会历史、科学知识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包括考古方法和技术。主要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主体，以地层学、类型学和以发现的遗物、遗迹为根据，来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迁。这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当然还需要多学科的配合）。

我国早在11世纪时就已诞生了收集、研究古代遗物的“金石学”。例如，宋代时甘肃陇西（今渭源县东南）发现了鱼化石，杜绾就进行了研究。他在《云林石谱》中说：“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鱼形，与湘乡（在湖南省）所产不异。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软。”他说的很符合今天的科学。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则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不过，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为世界所瞩目。

甘肃的考古工作开始早，成果显著，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

1900年，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箎发现藏经洞（今第17窟）和5万多件珍贵古文献。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中国学者周炳南等先后在敦煌的汉塞烽燧中掘得汉简数百枚。可说是甘肃考古的先声。

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等在甘肃庆阳县城北25公里的赵家岔和55公里的辛家沟（今都属华池县）的黄土底部砾石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第一批旧石器，成为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的先声。

1923年至1924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等地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址，他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就匆忙把甘肃史前文化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甚至提出中国文化西来

说的错误论点，但立即遭到尹达等先生的质疑和批驳。不过，安特生的发现和研究，却是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肇始。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学者布林在肃北塔崩布拉克发现约1500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轰动了当时的史前考古学界。20世纪40年代，甘肃科学教育馆（省博物馆的前身）的王永焱先生在武都县龙家沟附近发现约1000万年前的“武都森林古猿”和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化石，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森林古猿化石之一，也是世界上森林古猿化石分布最靠北方的地点，对研究古猿类的演变、从猿到人的进程和我国古人类的起源有极高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夏鼐、黄文弼、阎文儒等先生，对甘肃的考古工作都非常关注，并多次来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裴文中先生的足迹踏遍了甘肃的东、中、西部，发现了属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天水西山坪遗址；调查了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的遗址多处，并提出“沙井文化”的正式命名。夏鼐先生发掘了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临洮寺洼山遗址、武威吐谷浑王族墓，并发现了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等。他根据科学发掘资料，首次提出“马家窑文化”、“卡窑文化”（即“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的命名；指出安特生“六期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并根据寺洼文化遗址发现的火葬墓，结合古文献记载氏羌人的葬俗，得出寺洼文化为古代氏羌人文化的科学结论。夏鼐、阎文儒还在敦煌掘得汉简49枚。前辈们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和经验的丰富积累以及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甘肃考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的考古工作更有长足的发展——中央和本省都注重培养文物考古人才，建立了省、地、县三级文物考古机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建甘青考古工作队长年在甘工作，基本上年年进行调查、发掘和文物征集工作，发现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古遗址、遗迹和文物，使甘肃成为全国著名的文物大省。特别是在史前文化遗址、彩陶、长城、汉代简牍、石窟艺术、敦煌遗书，

以及国宝级、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及特色等方面更在全国占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考古资料强烈地激发了甘肃省与国内外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研究热情，他们结合文献记载和历史学、社会学、民族民俗学、自然科学的材料和他省他国的资料，对甘肃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按时代择要简介——

在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在泾川大岭上发现了旧石器早期（距今约20万年~30万年以前）甘肃先民生活的遗址和打制石器。在镇原姜家湾、寺沟口发现了旧石器中期的遗址和遗物。而旧石器晚期遗址、遗物则在甘肃东、中、西部都有发现，多达20多处。其中，泾川牛角沟发现的“平凉人”头盖骨化石，武山鸳鸯镇大沟、骨头沟发现的“武山人”头盖骨、肋骨化石，庄浪朱店乡长尾沟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环县刘家岔遗址发掘的数以千计的石器、石制品等，都尤为重要。经研究，上述甘肃旧石器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同时代的文化，而古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又是早期蒙古人种类型，因而可以断定，甘肃先民是中国本土的土著居民，后来的新石器文化与此一脉相承。

甘肃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为：

其一，调查和发掘了几千处遗址、几千座墓葬，有充分的证据推翻安特生的“六期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基本上确立了甘肃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谢端琚先生最近出版的《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提出：“师赵村一期文化”应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分出来，作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一种单独文化），其时间跨度从距今约8 000多年一直到距今约2 000多年，绵延不断长达约6 000年！大量的资料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而且，甘肃的彩陶文化存在时间长达约5 000年，数量多，分布区域广，纹饰繁复、多样、精美，艺术成就高，学术价值高，堪称全国之冠！

其二，发现了甘肃先民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如约7 000年至约8 000年前种植的粟、油菜籽，发明的纺织技术、彩陶、文字雏形（彩绘、划刻符号）；约5 000年至6 000年前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总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和水泥地面、地画、精美的彩陶、窑洞式建筑和陶鼓；约3 000年至4 000年前发明的青铜冶铸技术、青铜雕刻技术、青铜分铸镶嵌技术以及具纽铜镜、凸面镜、大型陶水管的制造和使用，大麻的种植，马的饲养与使用等等，都是全国首创或最早的发明之一！它们不仅可以复原当时甘肃各地不同人群、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而且也充分显示了甘肃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对我国古文化、文明的杰出贡献。秦安大地湾遗址长达3 000年的历史积淀，为伏羲、女娲诞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其三，涌现出一批精深的研究成果，上述两个方面都是研究的结晶。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重要彩陶纹饰之一的蔷薇科与菊科花卉图案，可能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庙底沟人是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华夏民族及其文化“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提出：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地望”、“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具备的特有表征”来看，“显然应当是羌人”的文化。而“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就是发展得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驱”。胡谦盈先生认为四坝文化也是古代羌人的文化。任乃强先生更认为，甘青地区所有的石器文化都是上古羌族的遗留。

林梅村先生在研究了甘肃、新疆若干史前文化之后得出结论：“正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将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印欧人的大规模入侵。”

他们都把甘肃的考古资料用于研究全国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再次显示了甘肃考古和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甘肃先秦时期考古成果显著，成绩斐然。

庆阳、平凉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父乙铜爵、父丁铜觚、父丁有盖铜角、父辛铜斝、父癸铜卣和“乍册吾”大玉戈等，工艺精

美，带有铭文、族徽，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对探索陇东古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交流，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庆阳、平凉地区是周王朝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夏朝末年，周人先祖不窋就率领族人来到庆阳，与戎狄杂处，经过三代人努力，逐渐壮大。庆阳县城东三里的帽盖山有不窋坟。灵台白草坡、宁县宇村等地发现不少西周墓葬、车马坑和遗址，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如溪伯（或释为“陔伯”）铜方鼎、灋伯铜提梁卣、穆公铜簠盖、中生父铜鬲、铜人头戟、耳形虎纹铜钺、带镂空兽纹鞘铜短剑、圆雕玉人等，仅一级文物就达30多件，对研究周代礼制、陇东方国、民族关系、科技水平等都极为珍贵。

特别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和圆顶山先秦国人贵族墓葬、车马坑的发现，以及刻有“秦公作”铭文的青铜鼎、簠、壶、编钟、匜、四轮无轅饰有鸟兽俑的微型车形器和金虎、多种纹饰金饰片、玉器、线雕狩猎纹骨片等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秦人失落的早期史、确定众说纷纭的秦人早期迁居地、认识秦人统一中国的条件、早期秦人与西方的交流，都是弥足珍贵的。

甘肃的秦汉考古更有许多重大发现——

其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万里长城，在甘肃境内长达4 000多公里（包括秦、汉、明三代），建筑技术、方法多样，有的至今保存基本完好，非常壮观。它是古代保卫边疆和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见证，是力量的象征，又是今天重要的旅游资源。

其二，甘肃境内发现的秦汉简牍多达5万多枚，在全国首屈一指，加上晋、唐和西夏的简牍共约6万枚，内容又非常丰富珍贵，多是史籍缺载的，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甘肃和全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极为重要。例如，秦简《日书》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秦文化典籍，《志怪故事》是我国最早的神怪故事。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表明，它是我国汉魏时期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邮驿机构。出土的2万多枚简牍，既有诏令、律书、官吏活动、物价、生活、经济和驿站管理机构、人员、车马配备、工作任务、制度的记录，也有属宾、康居、大月氏、乌孙、大宛等几十个国家与汉朝使节往来和羌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记载，非常珍贵，故被评为“1991年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其三，其他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如有战国木板地图、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汉代铜奔马及与其一起出土的铜车马俑群、多种多样的丝织品、汉代木雕、木板画、帛画、漆画、壁画，以及文房四宝和汉武都太守功德碑等，都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铜奔马、仪礼筒、医药筒、“白马作”毛笔、木辎车、木六博等，更是国宝级的顶尖文物。

甘肃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考古的重要成果——

其一，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考古发现表明，至迟从约4 000年前开始，甘肃与西方已有交往与交流。汉代张骞通西域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以后，东西方官方开始全面接触和交流，因为甘肃地处官方交流的主干道上，有官方保护；河西走廊的绿洲便于商旅和往来使节的生活；从汉末至唐以前，中原战乱频繁，“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景象，而甘肃的河西走廊则比较安定，成为中原人逃难之处，因而丝路贸易相当繁荣，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阗阗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丝路文化的丰厚积淀使甘肃再度成为全国瞩目之地。不仅如此，它也是全世界瞩目之地，正如著名的东西文化专家季羨林先生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甘肃考古发现的大量的佛教艺术遗迹遗物、用国内外多种文字写成的敦煌遗书、大夏鎏金银盘、外国与西域的钱币、壁画、丝绸、唐三彩俑、西凉乐舞等，就是最好的证据。例如，靖远出土的一件鎏金银盘，盘面上饰满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酒神和奥林匹斯山的12位主神，配以西方常用的40多种动物及葡萄、卷草纹，盘底还刻有大夏国铭文“价值490金币”，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经研究是中亚地区大夏国（一说东罗马）铸造的。它怎么跑到甘肃来了？显然是丝绸之路贸易、交流的结果。

其二，佛教艺术的繁荣。甘肃迄今发现的石窟寺莫高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堪称全国第一。另外，如炳灵寺石窟等也都蜚声中外。特别是敦煌莫

高窟，现存北朝至元代的洞窟 735 个，彩塑 2 000 多身，壁画 4.5 万多平方米，木构窟檐 5 座。这是把外来的欧亚文化艺术吸收、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中，并进行再创作的杰作，它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艺术精美，以及兼收并蓄的恢弘气度和独具的特色而成为罕见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1900 年在藏经洞（今编第 17 窟）又发现了公元 4 世纪至 11 世纪的佛教经典、多种的社会文书、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 5 万多件，内容丰富而珍贵，被誉为“古代学术海洋”，成为各国学者竞相研究的抢手资料，使敦煌学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显学”。为此，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武威天梯山石窟虽然知者较少，但它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石窟艺术向全省乃至全国传播、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誉为“凉州模式”，有人更称之为“中国石窟之父”。此外，甘肃还发现、收藏了很多佛塔、造像碑、各种质地的佛像、舍利棺等，艺术、学术价值都很高。特别是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隋唐时期的金银铜石玻璃舍利棺和一些写经、佛画、塑像等，都是国宝级文物。

其三，发现了甘肃画廊。从甘肃东部天水到河西走廊的西端，从甘南草原到靖远山区，发现了很多岩画、墓葬壁画、木板画、漆画和帛画，虽然它们的时代包括史前到元明，但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为多，故在这里一并介绍。这些画连接起来，恰似一座精美的画廊。其内涵表现了社会、民族的概貌，艺术性又相当高，甚至有不少是可填补历史、艺术空白的佳作。例如嘉峪关黑山岩画中一幅由 30 多人组成的大型操练图，形象地表现了少数民族的军事组织、操练和服饰，也体现了他们强悍尚武的精神风貌。有多幅优美的舞蹈图，单人舞、多人舞都有，甚至有的很像芭蕾舞的舞姿，令人惊叹。武威五坝山汉墓壁画中有一幅山林狩猎画，出现了我国早期的皴擦法和山水画，其人物、山林的比例基本上合适，比后来魏晋时期有些绘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绘技强得多，极为珍贵罕见。酒泉下河清汉墓壁画及甘肃各地出土的战国和汉代的木板画、帛画、漆画，其精美程度都清楚地表明，汉代河西地区的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是后来佛教艺术大发展的肥沃土壤。嘉峪

关、酒泉、敦煌魏晋墓出土了大量彩绘砖画、模印画和砖雕。仅嘉峪关6座墓就有620幅画（另2座墓无画），一砖一画。也有以整壁作的大型壁画，如酒泉丁家闸5号墓等。这些画内容丰富，表现了社会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嘉峪关5号墓的驿传图，二牛拉铁齿耙耙地图和酒泉高闸沟的太守断案图等，是全国最早的或仅见的。众多的采桑图、丝束、绢帛和农耕、畜牧、狩猎、宴饮、庖厨、乐舞图，应是当时甘肃盛产蚕桑丝织和社会安定富足的有力见证。画中人物不同的面相、服饰和帐篷等，表现了多民族聚居并和睦相处的历史事实（包括深目高鼻的西方人）。屯营图和屯垦图则表现了耕战兼备的边塞军屯生活。艺术上，构图丰满，主次分明，善以高度概括的精练笔画表现复杂的事物；重视刻画人物精神世界，形神兼备；多以线描为主，以设色为辅，线条流畅遒劲，色彩热烈绚丽，使整个画面充满生活气息，美不胜收，在我国的魏晋绘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酒泉果园西沟三座唐墓出土一大批模印砖和模印彩绘砖，有骑士、卫士、力士、乐伎、动物、花卉，有高浮雕和浅浮雕，有彩绘和素色，把魏晋时期的彩绘砖、模印砖、雕砖艺术融为一体，刻画自然，细腻，很有唐代气息。

其四，少数民族文化的考古收获。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古藏文文书，石窟中的吐蕃壁画，甘南地区发现的吐蕃墓葬等，对研究吐蕃—藏族的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武威青嘴喇嘛湾吐谷浑王族基地的发掘，获得青海国王慕容忠墓志、大周故西平公主（即弘化公主）墓志等9方墓志，对于研究吐谷浑的历史变迁和武威史地颇为重要。同时出土的彩绘木俑、木器、漆器、瓷器、铜器、丝织品、象牙棋子、阮咸琵琶、牛角梳等，多是唐代宫廷用物或代表唐朝工艺水平的文物，颇为珍贵。天水出土的雕刻精细的石棺床，肃南大长岭出土的独具特色的金银铜器，也相当罕见珍贵。

甘肃宋元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

其一，对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政权——西夏——的石窟寺、墓葬、遗址、窖藏的清理发掘、调查征集，发现了大量的瓷器、木板画、木器、金银器、丝织品、石刻、西夏文和汉藏文佛经、文书。其中，西夏碑、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经、西夏文写本医方、银锭、唐僧取经壁画、冶炼

图、酿酒图、西夏男女供养人画像等，多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珍品，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对其多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二，从漳县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家族元明两代墓葬群的发掘和甘肃各地的元代遗迹发掘、调查中，获得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如一批基本保存完整、高水平、很有特色的元代丝织品、服饰、玻璃器、瓷器、大型彩绘木屋、绘雕双龙串珠花纹的漆桌、八思巴字虎头符牌、北元八思巴字官印、大型铜牦牛、早期铜火炮及火药、子窠、藏传佛教铜佛像、唐卡、回鹘文和回鹘式蒙古文碑刻等，多是全国罕见的文物珍品。而元代兴建的许多儒、佛、道、伊斯兰教寺庙，是蒙元时期统辖欧、亚两大洲，复兴丝绸之路，兼融中西多民族文化的可喜成果。

其三，元明时期是甘肃现代许多少数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考古发现的天水、临夏、秦安、兰州、酒泉、武都、徽县等地元明所建的清真寺，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合写本《古兰经》，阿拉伯文铜器等，对于研究伊斯兰教的传播、甘肃信奉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形成和甘肃在伊斯兰教传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都是相当重要的。甘南、陇南、天祝许多寺庙极其珍贵的文物，对于研究藏族和藏传佛教及其宗派的演变发展历史甚为珍贵。而永登连城的鲁土司衙门，是甘青等地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宫殿建筑，对于研究元代以后蒙古族在甘肃的活动，颇为珍贵。

甘肃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实在太多、太重要、太有特色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游客早就要求我们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并出版发行。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93年5月，当我陪同他参观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展览”后，他就对甘肃文物大加赞赏，敦促我们早日出书，要我们速作预算，寄给他，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我们还谈到俄罗斯收藏的中国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批文献、文物在中国出版的问题。因为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副所长克恰诺夫教授曾给我写信，问我能否出面组织出版。我认为，能把解放前我国出土，但流散海外的大批珍贵文献文物影印出版，对保存资料、开展学术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马上写信与中华书局联系。宋署长听后

说：“中国社科院已经启动了这个工程，新闻出版署也支持，你可以不必重复搞了。”可见，哪个可搞，哪个不可搞，宋署长是实事求是的。宋署长走后，我马上兴奋地向馆长反映了宋署长希望我们早日出书，并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的美意。但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能够反映馆藏珍品全貌和研究水平的大型图录及著作出版不了，令我时常感到惋惜、遗憾。2001年春天，新世纪伊始，敦煌文艺出版社的刘兰生、张国强、何满意三位先生来找我，说他们要策划出版“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而且要出精品，希望我与兰生共同担任丛书主编，组织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春雷。我马上意识到，甘肃文物考古界长期的美好愿望有可能实现了！我怀着对他们的无限钦佩之情，欣然同意。一方面与他们多次研究选题和写作原则；另一方面在全省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物色作者，希望各卷都能由学有专长、成绩显著的专家主笔，并带动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经多方物色，多次恳谈，最后确定了有甘肃特色的10个课题和作者。有些专家学者，因手头已有其他重要任务，未能参加，殊为可惜。

按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策划要求，本丛书力争做到：以考古发现为主线，面向甘肃历史的各个方面；它既是地域文化的，又要与我国以至世界文化接轨；既汇集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又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文体表述；既重视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完美结合，又都是图文并茂的。希望读者在阅读这套丛书时，既有愉悦的心态和浓厚的兴趣，又能把甘肃先民的发明创造，社会、自然的兴衰变迁，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发扬先民们艰苦奋斗、敢为天下先的进取、创造精神，增强信心，吸取经验教训，以利于甘肃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自然环境的大改善和文物古迹的妥善保护！

最后，对著名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和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研究员在百忙中为本丛书题词、作序，致以诚挚的感谢！对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3年6月18日于兰州